



#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和鲁迅小说 中女性形象的跨时空对话

◎刘 莎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是德国伟大的剧作家、小说家和诗人，文学史家将他和歌德、席勒并称为德国古典文学的三大巨匠，甚至连托马斯·曼、黑塞等大作家都受他影响匪浅。克莱斯特的作品取材于不同的时代、地域和社会阶层，所阐述的主题皆与现实密切相关，其写作内涵深具复杂性、多义性和特殊性。他的笔下塑造了多个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种族和具有不同性格特征的女性形象，这些人物形象紧密结合现实，都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富有现实的批判精神。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对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一生始终致力于抨击封建旧势力，揭露社会黑暗现象。他的作品主题大都触及社会现实，始终贯穿着民主革命的人文精神。尤其是对生活在封建社会底层中最弱势、最易受侮辱的中国妇女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同情。鲁迅正是通过许多描绘女性形象的作品，将书写女性悲惨命运的主题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开创了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新时代。

本文将从“女性主义”和“比较文学”的角度，对克莱斯特和鲁迅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进行深入比较，从人物塑造、艺术表现和创作意图这三方面来分析这些女性形象的相同点和独特之处，并把这些特点与作家生存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结合起来分析，以期挖掘出这些特点形成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 1 比较异同

### 1.1 人物塑造

克莱斯特和鲁迅在他们的小说中都刻画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都受到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迫，也都希望能为自己争取到自由和幸福。其中，克莱斯特主要关注的是有教养的城市上层女性，如《侯爵夫人封·O》（*Die Marquise von O*）中的侯爵夫人封·O，《智利大地震》（*Das Erdbeben in Chili*）中的贵族女子唐娜·荷塞发等；而鲁迅则把注意力更多放在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村底层女性身上，像《祝福》中的祥林嫂、《离婚》中的爱姑和《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等。



在克莱斯特的小说中存在着迥然不同的家庭类型：从市民家庭《米夏埃尔·科尔哈斯》到贵族家庭《侯爵夫人封·O》，再到《圣多明各的婚约》，克莱斯特把刻画的家庭类型又延伸到了遥远的海地，在那里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战事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此外，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既有悲剧性的，也有结局圆满的。在《圣多明各的婚约》中，古斯塔夫枪杀了他的未婚妻托妮，并在意识到自己误解了爱人之后开枪自杀。在《智利大地震》中，荷塞发和赫罗尼莫不顾社会等级的差别而相爱，最终却因此失去了生命。在《侯爵夫人封·O》中，伯爵在举行婚礼一年之后重新赢得了侯爵夫人的心，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克莱斯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多富有自我意识和反抗精神，这有悖于当时德国社会对女性的典型标准。侯爵夫人在无意识下怀孕，因此被逐出家门，在经历过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之后，她的自尊心逐渐被唤醒，在意识到自己是无辜的之后，便毅然决然地决定独自抚养两个孩子以及未出世的孩子。荷塞发是贵族女子，与她的家庭教师相爱并未婚先孕，因为社会等级的巨大差异被当时的社会所不容，被家人所不齿，并且受到教会的严厉惩罚，但即便这样仍然不能阻止她对爱情和幸福的向往和追求。混血女子托妮生活在一个充满种族斗争的异化家庭，由于母亲对白人的仇恨，她不得不充当其谋害白人的帮凶。当托妮爱上白人古斯塔夫时，爱情的力量让她幡然醒悟，不惜以身犯险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来拯救爱人的家人和朋友。

而鲁迅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大多拥有悲剧性的人生，她们都是迷信思想和封建道德伦理思想的受害者，思想麻木愚昧、生活艰辛、缺乏远见。《祝福》中的祥林嫂最后沦落到沿街乞讨，在鲁镇辞旧迎新的祥和气氛中死去。《离婚》中的爱姑和丈夫经过三年的抗争最终却以九十元草草离婚。《伤逝》中的子君因为和涓生的爱情破灭，重返家庭，最终导致抑郁而终。

鲁迅描写的女性形象让读者感受到了希望与绝望之间的挣扎和斗争。鲁迅强调“民族性的改造”和“个性的解放”，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在旧社会期盼革命的农村妇女形象，如祥林嫂，她干活勤劳，却因“克夫”之说被主人家嫌弃；她性格倔强，不愿再嫁，到头来却仍然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爱姑，性格勇敢泼辣，却因为丈夫在外有了新欢而被休。子君，渴望婚姻自由却丧失了个体的独立，为爱情离家出走，结果幻想破灭不得不重返家庭。这些女性无一例外都想得到别人的帮助，从而获得解放和救赎。只有子君是个例外，她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城市女性，她想摆脱束缚，追求个体解放，遗憾的是在追求解放的过程中却以妥协告终。

## 1.2 艺术表现

克莱斯特和鲁迅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所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也存在着不少异同点。相同点在于这两位作家都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来创造女性形象。他们都忠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又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女性形象。另外，他们都重视对女性心理的刻画。通过人物的行为、语言和表情挖掘出其内心的想法，通过心

理描写表现出不同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他们又都是男性，都从男性角度对女性进行观察、描写和分析。

当然，两者的表现手法也各具特色。克莱斯特的小说情节曲折离奇，发展过程中充满了谜团和秘密，而结局又合情合理，让读者欲罢不能；语言风格个性化，擅长使用套句——反复修饰和说明的句式更能完整表达作者的意图，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多用叙述者的角度来讲述故事。克莱斯特的语言是开放性的，字里行间蕴藏着广阔的想象空间。他对所有事物进行了彻底而无情的描述，因为在他眼里这个世界就是无情的。而当叙述者——也就是作者本人看似对这样的世界做出妥协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智利大地震》里，本以为男女主人公已逃脱惩罚，可以去追求向往的生活，然而剧情发生逆转，不幸仍然降临到两人身上。阅读克莱斯特的小说让读者的心绪随着情节跌宕起伏，一直在绝望和希望之间来回摇摆。

克莱斯特富血性但又有理智，易激动但又具教养，欲望太多但又伦理感太强，他的内心充满矛盾。他从不曾对任何人保证什么，也从不觉得世间有什么是可以永恒不变的，因此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往往集天使和恶魔于一身。像《侯爵夫人封·O》中的伯爵以及《米夏埃尔·科尔哈斯》中的科尔哈斯，这两人都是非常正直的人，但是这两个人物又同时兼具恶的特性：伯爵在侯爵夫人失去意识后强暴了她，而科尔哈斯则为了所谓的伸张正义间接让妻子死于非命。

鲁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发表了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他在写作上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表达风格：语言简洁、新颖、准确、深刻、独特而又不乏幽默。此外，他善于运用各种能使作品精彩又引人深思的修辞手法。比如，在《伤逝》中多次运用了排比句：五个“这样”，两个“我恨”和三个“我想”，表达了涓生对子君深深的思念和悲痛之情。鲁迅的小说不像克莱斯特的以通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故事情节取胜，而是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塑造赢得读者。他丰富多样的叙事结构和创作形式符合故事中人物的性格特征，因此创造出了许多形象生动的人物形象。

鲁迅的小说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将悲剧与讽刺相结合，没有离奇曲折的剧情，而是以底层百姓的生活为主，注重细节描写，以白描手法刻画鲜明的人物形象，并挖掘其微妙的心理变化；语言简练、犀利又具有讽刺意味；多用第一人称的角度来回忆往事。这不仅使读者感到自然而生动，还赋予了作品深刻的思想意义。

### 1.3 创作意图

克莱斯特和鲁迅的作品及思想在各自生活的时代都具有叛逆性，也具有前瞻性和历史性。他们的作品都深刻反映了当时生活的那个时代，因此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们用犀利的艺术手法表现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以此来寻求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实现个人精神理想，而不是社会的要求，以期与严酷的现实和环境做斗争。

克莱斯特的作品和思想推翻了人们一直以来惯有的思维方式：他认为，事物发展并不总合乎理性，非理性反而更切合实际。他小说中展现的世界充满了动荡和矛盾，反

映的现实残酷而丑陋。他试图让同时代人通过其作品意识到这些潜藏的社会问题。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统治的支柱即大贵族、大地主和教会势力，其中对教会势力的揭露和抨击更是有情和入木三分。正是他作品中的矛盾、分裂和不安反映了这位生活在 19 世纪初的作家所独有的现代性。在《侯爵夫人封·O》中，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单身母亲追求地位解放的努力。当今社会，单身母亲并不少见，她们已经渐渐被家庭和社会所接纳。由此可见，克莱斯特在这部小说中揭示了一个直到 20 世纪才有所进步的社会主题。小说《圣多明各的婚约》一方面涉及种族冲突，另一方面关乎信任以及没有得到家人同意的爱情的后果。毫无疑问，在当今社会中，黑人和白人之间已经可以联姻，尽管家庭成员并不见得都能接受。

鲁迅在小说中批判了封建势力下的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对女性的侮辱和伤害，揭示出造成她们人生悲剧的根源所在。女性作为中国漫长历史里长期处于奴役地位，长期带有底层身份的群体，对她们生活经历的描写本身就具有反封建的性质。而作为反封建斗士的鲁迅自然也会借助创作女性形象来抨击封建礼教，进而达到改造国民性的最终目的。在对女性形象身份的选择上，鲁迅是全面的。他不仅塑造了封建社会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单四嫂子、祥林嫂、爱姑等，还为我们呈现了一位城市新女性子君。鲁迅试图表明思想中的“封建”与卑劣的国民性是没有“城乡差异”的。这几位鲁迅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女性形象为读者呈现了“吃人”礼教在“吃”的方式上的多样性。深刻表明了在一个封建性占主导的国家里，在一种愚昧无知的国民性大环境下，个体的悲剧命运无法逃避。妇女的解放必须与国民性的改造结合起来才有实现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鲁迅用这几个女性形象也昭示和暗示了一个更为深远的社会革命方向。

尽管克莱斯特和鲁迅所创造的女性形象无论生活环境还是性格特征都迥然不同，但是他们在追求女性的个体意识，体现女性的生存困境，寻求女性的解放之路这一点上不谋而合。

## 2 剖析原因

### 2.1 历史背景

#### 2.1.1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生活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欧洲，当时的德国正处于从封建社会到市民社会的新旧体制交替的转型期，社会、政治和文化等众多领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工业革命蓬勃发展，导致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模式的确立，中产阶级女性成为家庭妇女——男性的附庸。费希特（Fichte）（1796：304）在《自然法权基础》中认为：“女性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男性。女性结婚前处于父亲的权威之下；结婚后要完全服从于她的丈夫。”随着法国大革命（1789—1794）的爆发，女性希望获得更多的权利，女权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一些男性也参与其中）。女性积极反抗

专制政权，女性团体陆续在巴黎成立。她们除了要求和男人享有同样的参政权外，还要求修改婚姻法，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但是，在拿破仑政权的影响下，父权制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此后，女性再没有机会参加文化活动，没有选举权，并且也取消了法律对已婚女性的保护，丈夫成为其法律上的保护人。女性希望直接通过自身努力而实现权利成为不可能。但是，随着女权运动的开展和资产阶级小家庭的形成，人们对内心和情感的渴望和向往也孕育而生。人们开始试图去了解女性的心理并寻求两性——除生理差异之外在心理方面的差异，并从中得出男性天生属于社会生活，而女性更适合家庭生活的结论。两性应遵从由自然界确立的不同分工，并且发展和完善彼此不同而又互补的性别特点。克莱斯特是当时少数几个支持女性新形象的男性之一。虽然女性的感情和心理状况得到了重视和改善，但社会地位并没有显著的提高。女性在职场中的地位远远不如男性，现实中婚姻才是当时女性价值和存在感的体现。然而，即便是自由恋爱也不能完全被社会所接受，因为恋爱也会带来潜在的风险，如名誉受损、未婚先孕和生存威胁（《侯爵夫人封·O》中的侯爵夫人，《智利大地震》中的唐娜·荷塞发）。

### 2.1.2 鲁迅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发起了“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新文化运动，这场以鲁迅为核心人物之一的文化革新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对儒家传统意识形态的反叛，他们不断批判封建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在抨击封建专制的同时，他们也关注女性问题，提出了男女平等思想。20世纪初期，女权运动崛起，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争取教育权，在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的大力提倡、女权运动的强烈呼唤、政府的倡导以及西方教会来华势力办学活动的影响下，兴起了近代中国新式女子教育。一些知识女性独立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少数进步人士开始从女性的角度思考她们的社会处境，并进一步顾及女性的各方面需求。由于女权运动附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女性是被解放的对象而不是自我要求解放，因此当时的女权运动具有显著的男性特色。

## 2.2 个人经历

### 2.2.1 克莱斯特

克莱斯特父母早逝，他从小缺少家庭温暖，只和同父异母的姐姐乌尔丽克（Ulrike）一直保持不错的关系。他早年因家族传统而从军，后因厌烦军旅生活辞去军职。同年，他进入法兰克福大学学习经济学、哲学及自然科学。在此期间，克莱斯特结识了将军的女儿威廉明娜（Wilhelmine）并提出要与之结婚。但是，威廉明娜的父母提出结婚的前提是克莱斯特必须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因此，他曾承诺在完成学业后立即去办公室任职。不过，在他的坚持下，两人还是秘密订了婚，因为克莱斯特（1848：37）认为“一旦婚讯被曝光，爱情的魅力就会大打折扣。”他的这个想法在小说《圣多明各的婚约》里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托妮和古斯塔夫在发生性关系后秘密订了婚，并没有告知双方家人。次年，克莱斯特秘密前往维尔茨堡，关于此次旅行的目的他并未对任何人

言明，只是给姐姐乌尔丽克写了封信：“即使可以，也不要弄清楚我这次旅行的目的。替我向威廉明娜问好。把有关康德哲学的文章寄给我。我很快回来。”（Curt Hohoff, 1999: 22）这趟旅行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此后，克莱斯特由于康德学说陷入了认知危机，动摇了他的思想根基。他不再相信科学是获得知识和真理的途径，于是便终止了自然科学研究，继而全身心地投入了文学创作之中，以满足内心的需求。而他之后文学创作的核心内容也与此危机有关——质疑人类认知和情感的确切性，表现脆弱的现实和难以破解的真相。《米夏埃尔·科尔哈斯》《侯爵夫人封·O》《智利大地震》和《圣多明各的婚约》等都是围绕着认知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揭示在自然威力、突发事件和意识严重错误的猛烈冲击下，人的情感和认知会被引入歧途。

克莱斯特深知女性在社会上受到的歧视，他对女性持有在当时社会中并不被大多数人接受的观点——重视女性教育。克莱斯特是在为曾格将军家中的女儿们举办的讲座中结识了威廉明娜。他授课非常严格，如果她们低声谈话打扰到他的演讲时就会保持沉默。他还给她们进行思维训练，以激发她们的思维习惯，可以更容易理解文学作品。他在给威廉明娜的信中也多次提到教育问题，因为在他看来，“教育能够完善人格，对将来家庭生活以及子女的教育都颇有益处。”（Helmut Sembner, 1992: 42）在克莱斯特的多次旅行中，人们经常能看到他姐姐乌尔丽克和他一起穿着男装出现在公众场合，并一起参与当时女性很少出现的社会活动中。因此，他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多是出身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接受过教育且有自我意识的女性形象。

克莱斯特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认识了亨丽埃特·福格尔（Henriette Vogel）。她爱好音乐，与克莱斯特兴趣相投，成为好友。亨丽埃特身患不治之症，对生活充满了绝望。因此，一直想自杀的克莱斯特视她为一同赴死的理想伴侣。1811年，在万湖边，克莱斯特先开枪打死了亨丽埃特，然后又开枪自杀，两人被合葬在万湖边上。他的人生就像小说《圣多明各的婚约》的结局一样：古斯塔夫开枪杀死了爱人托妮，然后开枪自杀，最后被家人合葬在一起。

### 2.2.2 鲁迅

鲁迅虽出生于封建家长制大家庭，然而家族里的男性家长开明不刻板，对孩子的要求相对宽松，除了儒家传统书籍，还可以看所谓小说之类的闲书；另一方面，家族中的女性家长资质甚高，个性很强，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传统女性，更非胆小怕事，性格中有刚强和洒脱的一面。周家几代人的做人原则是：“如果先去欺负别人，是不行的；如果无故受欺负，就可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李新宇，2018: 12）因此，他的个性倔强不屈服，不顾国民党的迫害和世人的争议，坚持走自己认定的道路。

鲁迅笔下的很多人物形象都能从他的邻里乡党身上找到些许影子，女性也不例外。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中对鲁迅小说里的人物进行了原型索引，背景事迹考证，他（2018: 194-195）认为：“《祝福》中的祥林嫂形象来自鲁迅的一个远方伯母，虽然故事已完全不相同，但是精神失常的原因都是因为失去儿子的悲哀，在这一点上她们两人可以说是有些相同的。祥林嫂因为再嫁害怕死后被锯成两半，以至于穷死。

而这种迷信思想在民间相当普遍，再嫁也被视为不贞的表现。”小说《头发的故事》里有一段关于女人剪发的问题。剪掉头发的女生因此考不进学校，或者被学校除名都是现实中存在的事情。女人的头发仿佛有礼教的意义，剪去长发无异于打倒礼教，所以是绝不可容许的。鲁迅便很替那些因剪发而吃苦受难的女子不平，也可惜她们无谓的牺牲。

鲁迅终其一生都在从事着一项伟大的工作：“解剖”自己和中国社会。在他的小说中，尽管主人公大多命运悲惨，但总能让读者在绝望中感觉到还有一条通往希望的道路。对于中国女性的社会状况和地位，鲁迅除了给予同情之外，还希望能够唤醒她们的自我意识，并帮助她们过上新生活。他（1995：165）曾犀利地表示：“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绝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

### 3 结 语

克莱斯特和鲁迅生活的时代都是国家处于内忧外患，国家制度转型，各种改革新思潮纷纷涌现的时期。两人都深受外来先进思想的影响，并在他们的作品中予以充分的展现。他们的作品均具有现代性，饱受同时代人的非议和批判，却受到后人的高度赞赏和认可，并在世界文学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一生都可谓身世坎坷，颠沛流离。然而，他们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无论生活环境还是性格特征都迥然不同。这大抵跟两位作家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克莱斯特出身普鲁士传统的军事世家，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大城市，他先遵循家族传统成为军官，退役后进入大学学习，并与一将军的女儿订婚。因此，他身处上流社会，接触的都是上层人士。但同时，他又接受启蒙思想的熏陶，想法激进多变，渴望脱离保守和传统的社会。因此，他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大多出身贵族，富有教养但又不满家庭和社会的束缚，主动要求自我解放，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自己理想中的生活。

而鲁迅从小生活在一个相对闭塞落后的封建小城，身边多是些没有文化的底层老百姓。因为幼年家道中落，饱尝世态炎凉。虽然他之后去国外留学，广泛阅读国外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回国后和一群先进知识分子共同积极弘扬新文化、新思想和新道德。但是，童年的悲惨经历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甚至是阴影，所以他希望能利用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愚昧迷信，被压迫而不自知的农村妇女形象来呼吁社会制度的变革，给她们指明一条解放的道路。

#### 参考文献：

- [1] Curt Hohoff. *Heinrich von Kleist. Mit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M]. Kurt Kusenberg. 32.

- Aufl. Hamburg: Rohwolt, 1999.
- [2] Eduard V B ü low. *Kleists Leben und Briefe*[M]. Berlin, 1848. Zit. n. Helmut Sembner:*Heinrich von Kleists Lebensspuren*, S. 37.
- [3] Helmut Sembner. *Heinrich von Kleists Lebensspuren, Dokumente und Berichte der Zeitgenossen*[M]. Hrsg. Helmut Sembdner. Aufl. Frankfurt a. Main, Leipzig: Insel, 1992.
- [4] Johann Gottlieb Fichte. *Grundlagen des Naturrechts nach den Prinzipien der Wissenschaftslehre*[M]. Akademie Verlag, 1796.
- [5] 李新宇. 鲁迅的出身和周家的文化 [J]. 关东学刊, 2018(1), 12.
- [6] 鲁迅. 鲁迅全集:第6卷 [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 [7] 周作人.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作者简介:

刘莎,女,1983年9月生,浙江绍兴人,文学硕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德语语言文学研究。